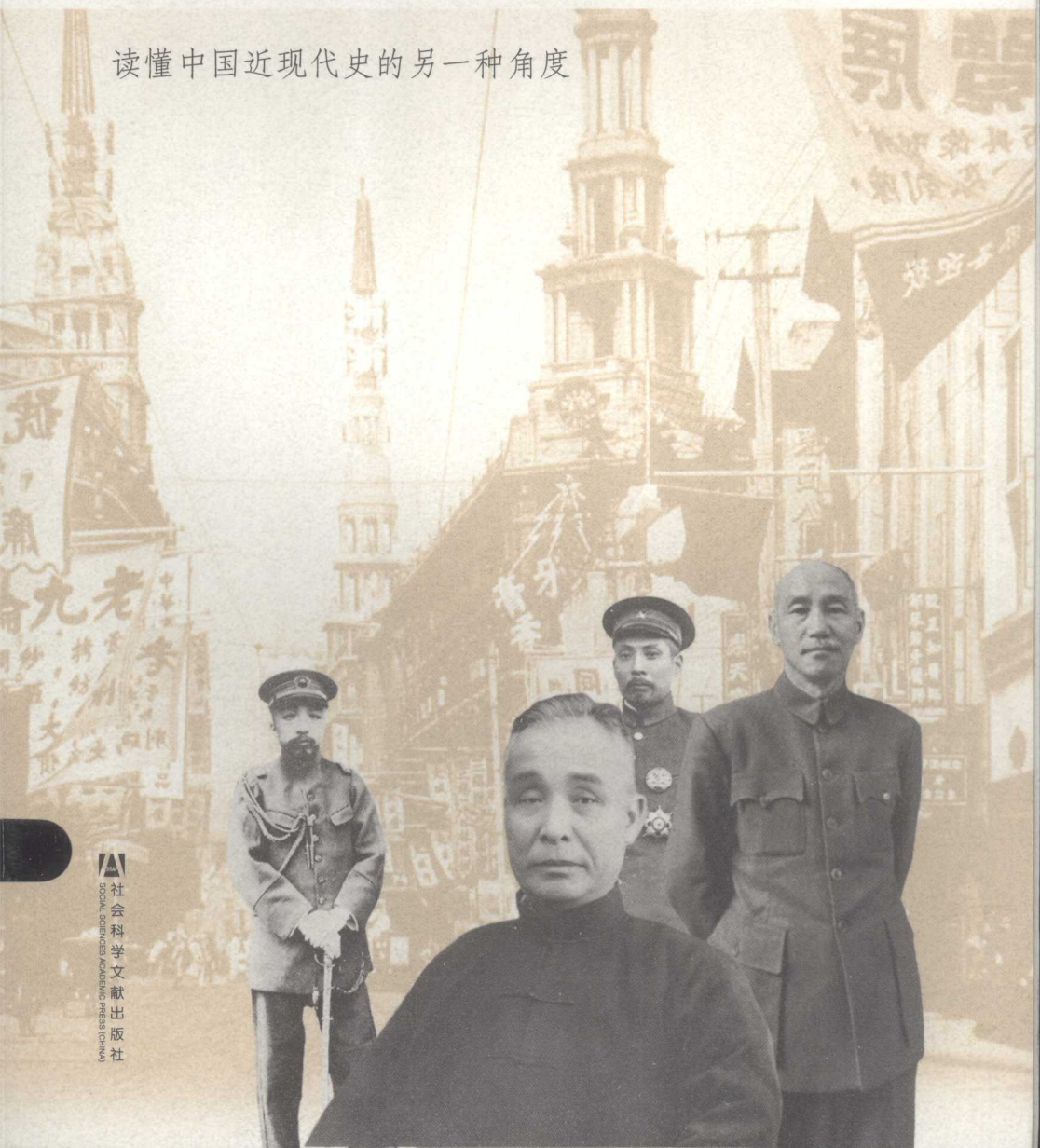


在动荡莫测的大变局中如何在商言商

政商中国： 虞洽卿与他的时代

• 冯筱才 著

读懂中国近现代史的另一种角度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013070605

K825.38
320

政商中国： 虞洽卿与他的时代

◎冯筱才 著



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

北航

C1678138

K825.38
32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政商中国：虞洽卿与他的时代 / 冯筱才著. —北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3.9

ISBN 978-7-5097-4931-9

I. ①政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虞洽卿(1867~1945) - 生平事迹
②行政干预 - 企业经济 - 研究 - 中国 - 近现代 IV. ①K825.38
②F279.29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80113号

政商中国：虞洽卿与他的时代

著 者 / 冯筱才

出 版 人 / 谢寿光

出 版 者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地 址 /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

邮政编码 / 100029

责任部门 / 近代史编辑室(010) 59367256

责任编辑 / 宋 超

电子信箱 / jxd@ssap.cn

责任印制 / 岳 阳

项目统筹 / 宋荣欣

经 销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(010) 59367081 59367089

读者服务 / 读者服务中心(010) 59367028

印 刷 /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/ 655mm 965mm 1/16

印 张 / 19

版 次 / 2013年9月第1版

字 数 / 250千字

印 次 /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097-4931-9

定 价 / 38.00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改变，从阅读开始



一本有深度的书。虞洽卿同时运作多种资本：经济、政治和社会资本，也获得多种回报。其中的矛盾，选择，利弊，可让我们看清真实的社会，看懂这个社会的商人。

吴 思

在当今政商关系盘根错节，既相互依存又冲突对立，高度聚焦社会眼球并影响国家大势的情况下，这本《政商中国》的出版可谓正逢其时。冯筱才是研究近现代中国工商经济史的专家，史料发掘及研读堪称一流，这本书足以代表他的水平。而更为重要的是，这本书可以告诉读者，要了解当今种种现实之由来与逻辑，当可回到历史中去找找原因。

杨奎松

前言

“政商”这两个字，在今天的中国非常流行。如果把它填入互联网搜索引擎，就会发现你面前将跳出数以百万计的相关信息，其意义也极为芜杂：或指代官员与商人两个群体；或被用来说明政治与商业之间互动关系；或专门指与政客拥有密切关系的特权商人。当然，这些意义，有时又混杂难分，不管如何，至少说明“政商”这个议题在中国已越来越重要。

作为特权商人的“政商”概念，至少在1919年就已在中国被人使用。这一年，上海有名的掌故家许指严出版一册《政商十大秘密案》，揭露晚清民初各地买官卖官横行，官商勾结，谋求暴利，此前中外辞典向所不载的新型“政商”便跃上历史舞台，^[1]许认为这种“政商”是社会祸害，其出现不但是士大夫阶层之羞耻，也是国家不祥之兆，甚至是造成民众生计痛苦的渊源。

其实，日本人很早就使用“政商”二字指称明治维新前后的“御用商人”，这一群体对日本政治经济演化影响至巨。^[2]这种使用更加关注的是商人与政府的特殊关系，但意义未必完全是负面的。北伐之后，日本的政治评论家，也用“政商”指那些支持南京政府的中国商人。最为他们注

[1] 毗陵不才子（许指严）：《政商十大秘密案》，译文出版社，1919，第1-2页。

[2] 政商，在日本是指明治维新前后与政府及领主有特殊关系的商人。早在德川时代，就出现一批受幕府保护的特权商人。这些商人在明治政权建立和推行社会改革中，对政府给予财政上的支持，也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植。明治十三年（1880年）调整经济政策后，政府实行扶植私人资本的政策，采取一系列措施，使这些特权商人转化为近代资产阶级，形成三井、三菱、住友、安田四大财阀为代表的一批大中财阀。褚葆一主编《经济大辞典世界经济卷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，1985，第489页。

意的一个政商人物，就是虞洽卿。1929年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的志村悦郎撰写《浙江财阀论》，他就直接把虞洽卿称作“上海著名的政商”、“浙江财阀的泰斗”。^[1]

今天中国人最熟知的近代特权商人，可能是晚清的胡雪岩。有关胡氏的“政商宝典”最近这些年在市面上很是常见，但在晚清的历史上，胡雪岩最多被时人称作是“官商”或“红顶商人”，从未被称作是“政商”。那么，何谓“政商”？如果我们把政商视作是一种新的历史现象，它为什么发生？对中国历史造成了何种影响？我们不妨先从虞洽卿的故事谈起。

虞洽卿：历史与形象

1936年10月1日，上海公共租界彩旗高悬，鼓乐齐天，市商会、纳税华人会、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等十六团体发起的“虞洽卿路命名典礼”在这一天举行。上午十一点整，盛大的万国商团中华队检阅式在跑马厅举行，接受虞洽卿的检阅。之后万国商团队伍及虞洽卿礼车、观礼佳宾出场游行，从马霍路一路排至爱多亚路，进入新命名的虞洽卿路。沿途万人空巷，欢呼若狂，观众不下三十万人。当虞洽卿礼车经过时，爆竹齐鸣，一时间邻近数条大马路交通均暂告停止。^[2]庆典典礼十一点半在宁波同乡会开始，中外来宾数千人参加。商会主席王晓籁及工部局总董安诺德（H.E.Amhold）先后致词，对虞氏服务社会之功绩极表推崇。中西来宾数千人，包括各国领事或代表官员、工部局官员均到场致敬。虞洽卿路沿途设置了松柏牌楼

[1] 志村悦郎：《浙江财阀》（上海满铁调查资料第6编）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，1929，第23页。

[2] 《虞洽卿路命名今日举行盛大典礼》，《申报》1936年10月1日，第13版。

四座，上面缀以鲜花电灯，光彩耀目；晚上九时跑马厅更燃放焰火，观者如云。^[1] 虞洽卿路由西藏路更名而来，是当时公共租界中区最宽阔的一条大马路。^[2] 此前公共租界并无以华人冠名道路者，故虞洽卿路之命名，是公共租界创立以来，工部局给予华人的最高荣誉。中央社发布专电，全国各地大报均加以报道。^[3]

虞洽卿路之命名，是为了庆祝虞氏七十寿辰及其旅沪五十五周年纪念。1867年6月19日，虞生于浙江镇海龙山乡山下村（现属慈溪市），名和德，字洽卿。父晚峰，长年在外做小本生意，母方氏，生二子一女，洽卿居长。像许多宁波普通人家的少年一样，1881年，他奉母命随人到上海学生意，最先在端康颜料行做学徒。^[4] 十年之后，他已被鲁麟洋行聘为买办。虞洽卿以其精明的生意头脑，以及过人的社交能力，不久就成为上海滩有名的洋商买办。不但华洋官场均需借重虞氏声望，上海社会各界亦已开始倚赖其居间调解的角色。民国成立，虞在沪上声势越来越显赫，并介入许多重大历史事件，其影响也扩展到全国。1924年，虞洽卿就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一职，其在任虽仅二年，却经历上海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数件大事：江浙战争、五卅运动，及随后发生的北伐战争，虞氏在这些事件中均有极重要的参与。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，凭借与蒋介石等人的深厚关系，虞洽卿成为中国商界最有名的人物，其行动更直接影响到上海公共租界外人治权的变化。1941年后他离开上海，但仍对国内时局发挥影响，亦深深卷入战时经济变迁，直至1945年病逝山城重庆。

作为近代中国最有名的商人之一，至少从1909年开始，有关虞洽卿之

[1] 《虞洽卿路命名典礼工部局已核准》，《申报》1936年9月29日，第9版。

[2] 《虞洽卿路命名典礼，市联会发起筹备》，《申报》1936年7月24日，第12版。

[3] 《沪西藏路改名虞洽卿路，昨行庆祝典礼》，《益世报》1936年10月2日，第3版；《沪西藏路改名虞洽卿路昨日实行》，《世界日报》1936年10月2日，第4版。宁波人对此事尤其引以为荣，最近还有人对70多年前的盛典仪式津津乐道。宜青：《西藏中路曾名“虞洽卿路”》，《新民晚报》（美国版）2012年7月4日，B4版。

[4] 《虞洽卿先生七秩大庆五五纪念》，《申报》1936年7月6日，第11版。

传记报道，就开始出现在中外媒体上。^[1]此一报道，尽管简略，但已将虞洽卿一生特点指出，他之所以闻名上海，一因其“热心公益”，一因其商业成功，其商业又多与“国家利权”相关。1931年，上海市商会为纪念虞洽卿旅沪五十周年，曾编有特刊一册，将虞氏一生主要事业均列出，其标题包括四明公所、大闹公堂、创办万国商团中华队、创办四明银行及宁绍公司、办南洋劝业会、辛亥革命、龙山开埠、三北公司、五卅惨案、加入华董。^[2]这些业绩后来不断被提及，构成其个人历史叙述的主要内容。^[3]不过，对外人对虞洽卿之经历，更关注的是他与上海公共租界发展史之关系渊源。1936年10月2日，上海《字林西报》（*North China Daily News*）在大篇幅报道虞洽卿路之命名典礼时，称虞是上海工部局的首席华董、租界华人社区领袖。^[4]密勒氏评论报编辑的《中国名人录》称虞是“商业领袖”（Business leader）与“公益活动家”（Public welfare worker）。^[5]

然而，就普通民众来说，对虞洽卿这样的大老板，他们更关注的可能是为什么他能够“发财”，因此，有关虞氏个人传奇轶事一直在市坊间流传，如“赤脚财神”、“口能容拳”等故事。^[6]亦有一些采访者，将虞洽卿树为成功人士的宣传榜样，把虞洽卿之社会地位与其“美德”联系起来，

[1] 《发起中国商团有功中国之虞洽卿观察》，《华商联合报》1909年5月4日，第5期，“海内外图画影片”，第1-2页。

[2] 上海市商会编《虞洽卿先生旅沪五十年纪念特刊》，编者印，1931。

[3] 可参见上海市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第十八区分会主编《上海虞洽卿路命名典礼纪念刊》，上海市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第十八区分会，1936年；汪北平、郑大慈编《虞洽卿先生》，宁波文物出版社，1946；刘涛天：《航业家虞洽卿先生传略》，《教育与职业》1937年第183期，第233-241页。

[4] Yu Ya-Ching Road, *North China Daily News*, Oct., 2, 1936, p. 4; Elaborate celebrations in honor of Doyen of Chinese members of Municipal council, *North China Daily News*, Oct., 2, 1936, p. 10.

[5] 《中国名人录》（Who is Who in China），上海密勒氏评论报，1931，第284-285页。

[6] 《看看人家——“赤脚财神”》，《兴华》1931年第28卷第20期，第21页；自在：《虞洽卿轶事》，《礼拜六》1946年第54期，第17-18页；《虞洽卿吃拳头》，《一周间》1946年8月4日第10期，第2页。

如“不为己”，“耐劳苦”等。^[1]不过，平心而论，无论是褒扬者，还是批评者，通常都肯定虞氏勤劳苦干。

媒体对虞洽卿的报道，最有影响的一篇文章，可能算1943年至1944年上海《杂志》半月刊上连载的一篇长文：《虞洽卿论》。^[2]这篇文章的署名作者是“方腾”，其实是中共著名宣传活动家恽逸群的化名。^[3]恽在上面这篇文章中，指虞是“浙江财阀”与英美帝国主义的双重代表，同时他也将虞洽卿形容成兼具买办与民族资本家双重身份的商人。

在描述“浙江财阀”或“江浙财阀”时，虞洽卿始终被认为是一个最重要的核心人物。^[4]这个名词最早是日本人用来称呼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商人。^[5]这种称呼，反映了日人对蒋介石政权性质的理解，也体现了他们对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看法，当然这种理解或看法都未必正确。^[6]后来中国国内的反蒋势力，亦常采用这个名词指控南京政府与商人的不当勾结，或暗指此政府背后的阶级背景。

对虞之身份定性，无疑是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而改变。中日战争结束后，随着国、共两党关系公开决裂，内战爆发。中共利用舆论力量大力抨击“江浙财阀”及“英美帝国主义”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，1927年虞

[1] 小记者述、周修荃记：《虞洽卿氏之难能》，《通问月刊》1931年第7期，第16-17页。

[2] 方腾（恽逸群）：《虞洽卿论》，《杂志》1943年11月第12卷第2期。

[3] 恽逸群（1905-1978），江苏武进县人，原名钥勋，字长安，1926年加入共产党，先后任中共武进县委、宜兴县委、萧山县委书记和湖北特委秘书长。1932年8月起任上海新闻通讯社记者，先后参加《立报》、《生活日报》、《救亡情报》等报纸工作。上海孤岛时期曾任主持《译报》、《导报》笔政，1939年赴港任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主任、《二十世纪》半月刊主编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转赴上海，在潘汉年领导下，进入日军情报部门岩井机关，与袁殊一起为中共搜集情报，其公开工作就是担任上海编译社社长。可参见顾雪雍：《恽逸群》，人民日报出版社，2005；顾雪雍：《奇才奇闻奇案：恽逸群传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6。

[4] 1933年，即有日本人在中国报纸上公开称虞洽卿氏为“浙江财阀之中坚”。庞京周：《上海市近十年来医业鸟瞰》（续），《申报》1933年7月31日，第15版。

[5] 志村悦郎：《浙江财阀》（上海满铁调查资料第6编）；森次勋：《上海财阀之鸟瞰》，汤怡译，《中国经济评论》1935年第2卷第1期，第80-94页。

[6] 魏友棻曾撰文指日本人用“江浙财阀”等概念分析中国问题是错误的。魏友棻：《论所谓江浙财阀》，《国闻周报》1937年第14卷第47期，第19-21页。

洽卿对蒋介石的协助便成为中外反动势力勾结的证据。从此之后，虞洽卿便成为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”中给蒋介石提供经济援助的所谓“江浙财团”的代表，反动的“买办阶级”典型。这种指控随着恽逸群著《蒋党真相》与陈伯达著《人民公敌蒋介石》的广泛流传，影响深远。^[1]到文化大革命爆发，地方单位的造反派更将此类说法进一步发挥，称虞洽卿是蒋介石的“干爸爸”。^[2]

1978年，邓小平开始提出对外开放政策，允许利用外资。在这种新形势下，如何评价买办商人，曾成为经济史学界一个论争主题，虞洽卿则成为一个标杆性历史人物。有学者认为仍应将虞定性为“买办阶级”，^[3]当时出版的《辞海》也持此论。^[4]但丁日初等学者主张应从虞洽卿的主要经济活动出发将其认定是“民族资本家”。^[5]1980年之后，这个看法渐渐占据上风，学者们转而从“现代化”、“民族主义”、“国家与社会”等视角来讨论资产阶级与南京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。^[6]

其实，如果我们能摆脱“资产阶级”的概念定势，重新理解这些与政

[1] 翊勋（恽逸群）：《蒋党内幕》（三），《新华文摘》1948年1月第2卷第9期，第347页。《蒋党内幕》后来改为《蒋党真相》，由多家书店出版单行本，发行量甚大。1983年又更名为《三十年见闻杂记》，修改后再版（金陵书画社，1983）；陈伯达：《人民公敌蒋介石》，中华新华书店，1949，第28页。

[2] 关于同惠砖瓦厂五反专案材料，武汉档案馆，136-6-47，第1页。1990年代，仍有人写野史时称虞洽卿是蒋介石的“干爹”。《蒋介石喊“干爹”的上海滩的头号阔佬——虞洽卿》，龙之光：《文摘精华（民国掌故A）》，四川文艺出版社，1995，第51页。

[3] 黄逸峰：《关于旧中国买办阶级的研究》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编《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集》（一），编者印，1979，第159-210页。

[4] 《辞海》（缩印本），上海辞书出版社，1979，第1855页。

[5] 丁日初、杜恂诚：《虞洽卿简论》，《历史研究》1981年第2期，第145-166页。

[6] 小科布尔（Parks Coble, Jr.）：《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（1927-1937）》，杨希孟、武莲珍译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8，第13-31页；易劳逸（Lloyd E. Eastman）：《流产的革命：1927-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》，陈谦平、陈红民等译，中国青年出版社，1992，第347-383页；Joseph Fewsmith, *Party, State,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: 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, 1890-1930* (Honolulu: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, 1985)；白吉尔（Marie-Claire Bergère）：《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》，张富强、许世芬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8，第215-216页；朱英：《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：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》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7。

治有密切关系的商人，或者可以给我们理解历史与现实问题带来帮助。我们要给虞洽卿这个历史人物一个基本的定位，或许“政商”比其他名词要更加适合。

政商与二十世纪中国

“政商”一词，除了用来指称虞洽卿这种与特权紧密结合的商人之外，在本书中，其实更重要的，也是想通过商人的故事，来讨论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开始出现的一种新的政治经济现象——政商化。也就是说，“政商”可能已经不是个体性的官商勾结这么简单，而是通过一些机制，官与商渐渐形成一种稳定的利益结构，或可称之为政商利益共构网络。这个词与传统的“官僚资本”一词有一些接近，不过，此处所讲“政商化”又不简单等同于“官僚资本化”。在晚清民国，控制政治资源者，未必一定是官僚，其他拥有或明或暗之政治势力者，亦能通过与商人的结合，造成利益捆绑，所以“政商”中之“政”，也包括其他不掌握政府权力的政客。近代中国政局动荡，城头变幻大王旗，行政体系的不稳定，以及军人及党人权力的重要性，都使得政商化的现象绝不仅限于官僚系统。从在野到执政，在迅速变化的时局中也很容易出现，因此政客与商人之间便容易造成一种潜在的利益投机结构。

本书使用政商化一词，也是想表达公共政治与私人商业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。尤其指公开政治经济活动之下的政商利益结合，尤其是指一种稳定的政商利益生产网络。在政商化之情形下，政商结合日益制度化，官员给商人之支持或商人对政客之支持均呈常规化，甚至以某种制度性办法来操作进行，当然这也可能造成官僚体系或政治运作体系之潜规则。官员之政绩生产，往往需要商人辅助配合。无论是招商开发利源，还是合作推动建设事项。但是

在此过程中，官员或政客有可能把公共权力寻租，与商人结合共同追逐暴利；商人也有可能以公共利益为合法性诉求，谋求获得权力的庇护，达到暴利生产的目的。从表面上来看，他们的作为都是为了公共利益（如推动地方经济建设、挽救国家利权等），但在这层合法性外衣下，私下的政商利益交换便会频繁发生，甚至形成一种潜在的稳定性利益生产机制。这种利益生产的暴利性，可能会诱导官员（或政客）选择性地推动所谓“公共事业”。健康的政商关系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并非坏事，然而，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如果出现政商化的发展趋势，那么就可能陷入一种超稳定的暴利生产结构，这不但给政、商两方都会带来潜在的危险，他们也很难自行摆脱这种机制。或者说，政商化是一种不健康的政商关系发展的结果。

这种政商化结构，可以被看做是晚清以后出现的一种新的历史现象，并且成为左右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潜在线索，甚至直接左右了国家政治经济的走向。需要区分的是，我们所讲的“政商化”，不是简单的个体道德的指控。目前大众所讲的“官商勾结”，多半是从道德层面入手，指其钱财来源的非正义。但政商化，则强调官员与商人都通过这种结构获得暴利，打倒个别的“奸商”或惩处违纪官员并不能解决这种结构性难题。为何这种体制性的政商化愈演愈烈，这种政商化的过程是如何产生的？目前学者大多数仍是从所谓“现代化”的理论来讨论中国 20 世纪的政治经济转型，然而，一个力求现代化的国家，怎么最后为政商结构所绑架而不可自拔呢？

为说明这些问题，以下本书将从虞洽卿的故事入手，追踪他个人“发迹”历史，分析其如何一步步成为近代中国最有名的政商人物。其个人的商业帝国，是如何紧紧地与晚清民国时期的政治历史扭在一起。同时也借此研究政商化在中国如何从萌芽到固化，此一拥有特殊色彩的“利益结构”如何左右了政治和商人的关系，甚至对近代中国政治变革过程造成深远的影响。

目 录

前 言 /01

虞洽卿：历史与形象 /02

政商与二十世纪中国 /07

【第一章】

改革年代之政商形成（1891-1911）

晚清变局中的官僚与商人 /003

从洋行买办到宁波帮领袖 /007

上海租界的中外调人 /014

“二品道台”的官场交友 /018

近代商团之滥觞：华商体操会 /023

捉襟见肘的“两江新政”：南洋劝业会 /027

不同篮子里的鸡蛋：虞洽卿的早期生意 /031

身份资本、官僚政绩与政商形成 /038

【第二章】

革命转换之关键人物（1911-1914）

革命推手：虞洽卿与江浙光复 /044

从陈其美到程德全：协助上海财政 /050

“二次革命”中虞洽卿的态度 /053

“安慰”革命者：资遣党人 /056

动荡时局中的政商经纪人 /060

“革命”、秩序与政商 /066

【第三章】

“爱国时代”之政商生意（1915-1925）

虞洽卿与救国储金运动 /072

段祺瑞的总商会会长：“五卅干城” /092

“国家主权”与虞洽卿的商业帝国 /107

民族主义商业战略的双刃效应 /119

【第四章】

北伐前后的“左派资产阶级领袖”（1926-1927）

“左派资产阶级领袖”与上海第一次工人暴动 /135

从二次暴动到三次暴动：“民众领袖”的变化 /148

中共对联虞政策之争论与反省 /164

意识形态、政治站队与商人选择 /170

【第五章】

委员长的代理人：南京时期的政商模型（1927-1937）

为蒋介石募款 /178

“商界领袖”的政治客串 /184

虞蒋关系的政商回馈 /189

威权政治、代理人与政商 /206

【第六章】

战争年代之政商现形记（1937-1945）

在孤岛上海 /214

回归商人本位：虞洽卿在“大后方”的生意 /231

条子、面子与银子 /237

结 论 /245

参考文献 /261

后 记 /279